

彻底批判 孔子的反动文艺观

辽宁人民出版社

毛主席语录

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目 录

- 深入批林批孔 继续搞好文艺革命 江 天 (1)
- 彻底批判孔子的反动文艺观 安达钟 (7)
- 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文艺理论
- 批判孔孟的反动文艺观 严 已 (15)
- 孔老二怎样利用文艺为反革命复辟服务
- 陕西省建工局 胡义成 (22)
- 孔子是利用文艺搞复辟的祖师爷
- 苏 恒 邓双琴 (30)
- 音乐上的复古和政治上的复辟
- 上海戏曲学校 许国华 夏 野 林友仁 (42)
- “复乐”就是复辟 宁 殷 石 鸣 (47)

深入批林批孔 继续搞好文艺革命

江 天

党的十大号召我们：“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当前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斗争，是一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斗争。这场政治斗争，必将进一步推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包括文艺领域的革命。因此，深入批林批孔，也是继续搞好文艺革命的头等大事，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积极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中去。

批林必须批孔，批孔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是一个孔孟之道的狂热的吹鼓手。他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他在文艺方面所干的、所鼓吹的也是孔孟的那一套东西。批林结合批孔，可以在政治上看清楚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可以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林彪这个政治骗子效法孔老二，利用文艺搞反革命复辟的罪恶阴谋。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

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两千多年前，处于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孔老二，为了维护奴隶制度，开历史的倒车，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革命复辟纲领；同时，又鼓吹什么“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妄图利用奴隶主贵族文艺来改变适合于当时新兴地主阶级需要的社会风气，以配合恢复“周礼”，更有效地统治奴隶；他的所谓“不能《诗》，于礼繆；不能乐，于礼素”，也清楚地表明了孔老二所提倡的奴隶主贵族文艺，是实现他“复礼”目的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反革命工具。

搞“复礼”就是搞复辟，搞复辟就要搞复古。政治上如此，文艺上也是如此。当时，孔老二极力鼓吹奴隶主贵族文艺，他所推行的文艺路线，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复古主义的路线。当着奴隶主贵族文艺随着奴隶制旧秩序一起分崩离析的时候，孔老二气急败坏地叫嚷：“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死心塌地的要做奴隶主贵族文化的卫道士。他不遗余力地推崇和宣扬奴隶主贵族文艺，妄图配合他的“复礼”来挽救当时奴隶制度面临的“礼坏乐崩”的局面。

叛徒、卖国贼林彪承袭了孔老二的衣钵，祭起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的黑旗，把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他万事中“唯此为大”的事；他在文艺上也效法孔老二，大搞颂古、复古。当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充斥文艺舞台的时候，他竟然露骨地叫嚷什么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解决

了”，还鼓吹文艺创作要向封、资、修文艺看齐，“争取够得上在世界范围内比的水平”，以迎合国际上帝、修、反的需要。文艺舞台上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宣扬的就是“忠孝节义”之类的孔孟之道；而林彪这个两面派却在见不得人的阴暗角落里，胡诌什么“忠孝节义”可以“用其内容”；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则鼓吹“忠孝节义”之类的孔孟之道“在现代可以成为新的美德”。他们要继承孔老二所鼓吹的“道统”，作为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武器。林彪一伙，又利用文学、音乐、美术、电影等艺术形式，歪曲历史，伪造历史，为野心家林彪歌功颂德，为他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这一切，就是要使文艺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阴谋服务。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政治上走的是孔老二的老路，在文艺上走的也是孔老二的故道。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就可以对林彪在文艺问题上所鼓吹的反动谬论追根寻源，对林彪反党集团所维护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刨根清底，彻底肃清它的思想影响。

林彪一伙宣扬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是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理论基础，它的根子就是孔孟之道。什么“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泛爱众”，什么“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就是人性论最早的说教。林彪鼓吹的“灵感论”、文艺创作需要“特殊艺术才能”等等谬论，也是源于孔孟的“生而知之”、“先知先觉”等反动的唯心主义先验论。

当前侵蚀着我们文艺创作的“无冲突论”，是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所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文艺上的反映，它也源于孔孟之道。孔孟的“中庸之道”，宣扬“礼之用，和为贵”；卖国贼林彪则叫喊中庸之道“合理”，狂呼“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孔孟鼓吹“过犹不及”；林彪则叫嚷“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它就会破坏统一”。孔老二提倡文艺作品要“温柔居中”，使“忧愁之感不加于心”，“暴厉之动不在于体”；林彪则鼓吹“咖啡文艺”、“养人文学”，反对文艺作品反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凡此种种，都证明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的文艺观，与孔孟之道是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批判孔孟之道，就是挖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根源，挖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根源！

当前，文艺战线上形势一派大好。但是，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然是很激烈的。从孔老二到林彪的反动文艺思想还在腐蚀毒害人们，侵袭我们的文艺队伍。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能够使我们更好地认识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就是要革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艺的命，革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命；就是要使我们的文艺，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指引下，遵循“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但是，要革命，就有反革命；要变革，就有反变革。这是一条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回顾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战斗历程，在革命样板戏的成长过程中，刘少奇叛徒集团、林彪反党集团，都曾经对革命样板戏进行疯狂的破坏和捣乱。今天，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垮台了；但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还是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时刻都在梦想复辟。他们散布“今不如昔”的论调，妄图为刘少奇、周扬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翻案。他们恶毒诽谤革命样板戏和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攻击我们的革命文艺作品少，质量不高。在有些地方，一小撮阶级敌人公然用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文艺，来和我们争夺思想文化阵地。前不久，又出现了所谓欧洲资产阶级的“古典音乐”“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比较健康、明朗”等修正主义论调，妄图为资产阶级文艺的泛滥大开绿灯。总之，他们采用“颂古非今”的手段，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文艺革命，让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重新来专我们的政。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颂古非今”历来是一切没落的剥削阶级搞阴谋复辟的反革命伎俩。当年的孔老二，对于当时新兴的封建制度，深恶痛绝；对于当时随着新兴封建制度成长而出现的新兴文艺，不仅百般咒骂，而且还发出了要取缔禁绝的叫嚣。但是，“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孔老二的“颂古非今”，没有能够挽救奴隶制的灭亡，也救不了奴隶主贵族文艺覆没的命运；一切反动派倒行逆施的反革命伎俩也总是

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历史的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今天，我们把批林批孔和文艺战线上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联系起来，就能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地主资产阶级顽固派反对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胜利也是必然的。我们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斗争，正在广泛深入地展开。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文学艺术战线上的革命战士，也必须冲锋在前。因为在我们文艺领域，曾经被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长期专过政，林彪反党集团也曾疯狂地进行破坏和捣乱，孔孟之道的流毒是很深的。斗争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但是，我们有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只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就一定能打好批林批孔这一仗。文艺战线上文学、戏剧、音乐、舞蹈、美术、电影以及其他各个艺术领域的同志们，都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消除各种思想障碍，向工农兵学习，同工农兵相结合，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投入战斗！我们一定要在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进行自我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的斗争深入下去，开花结果！

（原载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

彻底批判孔子的反动文艺观

安 达 钟

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孔家店——千百年来成了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用来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黑店。历史上一切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都要请出孔子的亡灵来为他们的反革命勾当服务。“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都是孔家店的政治掮客。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里，他们极力兜售孔家店的各种黑货。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的革命洪流，再一次冲击着孔家店的幽灵，文艺黑线的头目周扬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大叫“孔家店的后院还有一个很大的仓库。那里有几千年的文化遗产。”胡说什么要“把旧时代的意识形态做为系统的东西保留在今天的文艺中”。现实的阶级斗争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在今天批孔运动的新的革命高潮中，我们完全有必要看一看孔子文艺观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反动货色。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我们剖析孔子

文艺观的反动性，首先要了解孔子所处的时代，了解当时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两条路线斗争。孔子的文艺观是从属于他的政治观的，孔子所坚持的文艺路线是服务于维护奴隶制的政治路线的。

孔子是春秋晚期的人，是一个没落了的奴隶主贵族的孝子贤孙。春秋战国正是社会制度发生激烈变革的时代。人类社会第一个剥削制度——奴隶制经历了夏、商、周一千多年的历史行程，已经完全腐朽没落，在大批奴隶不堪奴役而纷纷逃亡和起义的历史风暴中，新的封建制度正在兴起。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用奴隶和平民反抗奴隶主的斗争，突破奴隶主的束缚，向奴隶主贵族阶级夺权，进行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以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动，正是当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可是孔子却始终顽固地站在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为维护崩溃中的奴隶制而四处奔波。他的倒行逆施不仅为劳动人民所唾弃，骂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顽固派，而且也遭到各国新兴地主阶级的强烈反对，只好发出“吾已矣夫”的哀叹。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正是在这“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况下，为了进行“文字斗争”，孔子开始整理古籍，著书立说，利用其掌握前代文化典籍懂得周代礼制的特殊条件，大造复辟奴隶制的舆论。孔子反动学说的核心是“仁”。什么叫做“仁”，孔子自己供认“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要恢复周礼，把社会拉向后退。在文艺

观上，孔子极力把文艺纳入为他的反动的政治服务的轨道，以挽救奴隶制的“礼崩乐坏”的局面。

首先，在孔子看来，文艺应该成为其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的形象化的教科书。

孔子从反动的奴隶主的功利主义出发，妄图培养一批“克己复礼”的“仁”人“君子”，因而他以所熟悉的《诗》、《书》六艺之文，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就包括文艺。（《论语·述而》）孔子十分重视诗乐维护奴隶主统治的教育作用。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是孔子教育观的出发点，也是他文艺观的出发点。孔子的君子标准一是要质，就是要懂得儒家的礼义，二是要文，有文采，包括懂得诗与乐。孔子认为奴隶主“君子”们是要“立言”的，但“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就是说：言论如没有文采，就不能传播开来。又说“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不学诗，就不能讲出漂亮动听的言论来。总之，文与质的统一就是修身立言，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君子。而要培养这样的君子，诗乐又都是很重要的。孔子强调仁礼是根本，诗乐是为仁礼服务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但言辞的“文”与“巧”可以直接影响到所谓君子的“不学礼，无以立”的社会效果。他所注重的是“吾道一以贯之”的奴隶主阶级的“政事”，及其“德行”，而“文学”、“语言”则是奴隶主贵族道德修养的需要，也是参加政治活动的需要。他们背诵

《诗经》是作为外交辞令之用的。例如：《左传》中有这样的记载：秦穆公享晋文公。晋文公赋《河水》，秦穆公赋《六月》。这是勉励他为周天子出力（《僖公廿三年》）。楚令尹王子围享晋赵武，赋《大明》，赵武认为他太自大，赋《小宛》以相劝戒。（《昭公六年》）可见奴隶主贵族“不学诗，无以言”的目的在于从事政治活动的需要。故孔子才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在他看来，“诵诗三百”目的在于“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论语·子路》）总之，孔子坚持反动立场，认为重视德行是根本的，重要的，文化是从属于其政治目的的。所以，文学艺术要为其培养反革命复辟的政治人材服务，这一根黑线贯穿在他有关文学语言的言论之中。“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这就一句话泄露了天机，原来他要君子学文（包括文艺在内）是为了使他们不至于离经叛道，犯上作乱。过去，有些学术著作，啧啧称赞孔子是什么“正确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辩证地解决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种论调是错误的，是有害的。正如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我们认为，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的仁、礼、诗、乐四位一体的文艺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的观点是毫无相同之处的。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我们

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因此，我们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指的是为当时革命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服务，而不是为任何抽象的政治服务，更不是为反动的政治服务。孔子虽然十分重视利用文艺为其反动的政治服务，但他不可能“正确解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正确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才是可能的。

其次，在孔子看来，文艺应当“移风易俗”，成为挽救“礼崩乐坏”、“天下昏乱”的有力武器。这就是“温柔敦厚，诗教也”的反动实质。二千多年来，这种反动的文艺观对儒家正统学派具有长远的恶劣影响。

我们知道，在孔子时代没有别的文学作品，有的就是殷周以来的三千多首古诗。但是，这却遭到孔子一派儒家的摧残，竟被一笔削砍了十分之九。如今剩下的这“诗三百”也大都经过孔子的篡改和曲解的。正是这种历史原因，孔子才非常重视诗的作用，强调应该学诗。他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女（汝）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與？”（《论语·阳货》）这就是从德行修养上来强调学诗的重要性。孔子评价《诗经》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所谓“无邪”，就是对维护奴隶主反革命专政，复辟奴隶制有利。后来，《毛诗本》曾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解释从反面证实了孔子维护奴隶主统治秩序的罪恶目的，说明了在孔子那里“仁、礼、诗、乐”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情”和

“礼义”都是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这就开了后代“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的先河。把诗三百的全部内容，概括为“无邪”二字，正说明了孔子删定诗经的罪恶政治目的。例如《关雎》这首诗，孔子把它编定为《诗经》第一首，说什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据说是它表现了“后妃之德”，因而可以“风化天下”、“而正夫好”，“夫妇有别”则“父子亲；父子亲，则君臣敬；君臣敬，则朝廷正；朝廷正，则王化成”。（《毛诗序》）把它说成体现了孔子毕生为之奋斗的“礼治”、“正名”的思想意识，是有它的道理的。

孔子企图运用文艺挽救“礼崩乐坏”的政治局面，还集中表现在强调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作用这一段话中。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在周扬之流的影响下，对于这段话，过去有些文艺理论著作，作了超历史、超阶级的吹捧。说什么“孔子这种主张正是奠定了文学批评上现实主义理论基础”。甚至认为孔子正确认识了文艺作品具有教育意义，认识意义和审美意义。把现代人的思想挂在孔丘名下，起了美化孔丘，贬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划时代的革命意义的作用。孔子“兴、观、群、怨”的提出，是有他特定的具体含意的。虽然，他也提到“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但根本的目的却是“事父”、“事君”。是为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他的“兴、观、群、怨”也决不可做抽象的理

解。何谓“兴”？就是诗歌具有潜移默化的感奋作用，但是正如各阶级人人相通的“共鸣”说是从来不存在的一样，人类共通的“兴”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孔子强调“诗言志”是利用诗歌表露他们反革命复辟的心声的。何谓“观”？就是站在一定阶级立场上来要求诗歌起“移风易俗”的作用，恢复旧日奴隶制全盛时代的风俗习惯。这和唯物论的反映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何谓“群”？正如杨荣国同志所说的，“孔子感到当时奴隶主内部矛盾很尖锐，你争我夺，这样就会导致奴隶主内部统治的崩溃。所以他提出：只要奴隶主内部人人都能对祖先，对父母尽孝道，就可以从纵的方面将奴隶主团结起来。‘悌’就是平辈的兄弟之间，彼此都能相亲相爱，就可以从横的方面将奴隶主团结起来”。可见“群”，就是要求通过学诗让奴隶主贵族团结起来，一致镇压奴隶的反抗。例如子贡引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二句诗来说明“贫而乐，富而好礼”时，孔子就大加称赞说，“赐也始可与言诗矣”，（《论语·学而》）就是一个铁证。何谓“怨”？其实就是小骂大帮忙，目的是为了“止乎礼义”。儒家的“美刺比兴”，“怨而不怒”的反动诗歌传统，都说明了孔子所说的“怨”，决不是反抗，而是规劝。总之“兴、观、群、怨”为奴隶主服务的阶级性是十分明显的。那种抽象的理解，空洞的称赞，是尊孔读经的思想的流毒尚未肃清的反映。

《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出：“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文

艺黑线的头目周扬曾经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拾来了孔子这块“敲门砖”，在孔家店里的后院里捡起一大堆破烂武器，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动猖狂进攻，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进行反革命复辟阴谋活动。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告诉我们，今后还可能出现新的“四条汉子”，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彻底批判孔子的反动文艺观，肃清其流毒，清除其影响，对于抓好文学艺术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是有深远的现实意义的。

（原载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安徽文艺》）